

出口到美国。但是,很多名牌玩具属加工贸易。例如,芭比娃娃玩具已有 40 多年历史,迄今仍每秒钟销售 2 个,畅销到 140 个国家。据统计,平均每个美国女孩拥有 8 个芭比娃娃。1996 年 9 月 22 日《洛杉矶时报》载文介绍,在美国市场每个芭比娃娃玩具售价为 9.99 美元,从中国进口仅为 2 美元,其中:原料产自中东,在美国和中国台湾加工为半成品,假发是日本生产的,包装材料由美国提供,这几部分为 1 美元;运输和管理费为 0.65 美元,中国所得加工费仅 0.35 美元。但按原产地规则,这 2 美元都统计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之中。美国媒体提供的资料很清楚地说明加工贸易对谁更有利。

按中国海关统计和中国有关专家预测,到 2005 年,中美贸易额将达到 1280 亿美元左右,其中中国进口额将达到 450 亿美元左右。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扩大开放,美国有望在 2010 年前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商品来源国。届时,如果以进出口商品和服务统计,中美双边贸易平衡问题将大大缓解。美商在华投资也将迅速增加,到 2005 年美国对华实际投资累计金额将达到 600 亿美元以上。

展望中长期的发展趋势,中国和美国经济前景良好。只要两国在政治上不搞对抗,妥善解决分歧,减少摩擦,扩大合作,中美经贸关系将会继续发展,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但是,还要看到,中美经贸关系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中国在其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它虽然有助于推动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但不足以防止中美之间像最近一个时期那样发生政治关系恶化的现象。有鉴于此,中国在对美关系中尤其要注意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既要立场坚定,又要行动有力。

第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化,中国具有实现民族振兴的良好外部条件。

第三,加强经济外交,扩大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与合作。唯其如此,才能使自己不会过多地依赖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的市场。○

## 影响中美关系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

许振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教授)

对影响中美关系的国家战略因素、军事安全因素、经济因素、两岸关系因素,诸多学者已经做过详细、全面、多方位的探讨。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冲突也是左右着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意识形态因素就一直在影响着美国当局的决策,影响着与中国发展一种健康、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只是在冷战中后期,特别是 1972 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出于对国际格局的战略认识,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虑,美国才一度放松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势。这种局面在冷战结束、苏东集团解体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两国联合抗苏的战略态势不复存在。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对其行动的各种客观制约大大减弱。美国遂得以畅行其志,无所顾忌地在国际政治中推行自己

的价值观,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武器攻击他人。

我们因此看到了冷战后西方学术界的日益右倾化、西方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日益贫困化、单一化。法国知识界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在 90 年代初指出了单一思想统治的危险——*pensée unique*,即人类在本该是最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领域中的统一或同一——统一到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政治)、盎格鲁—萨克森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和人权(价值观)的轨道之中。对这种美国式单一思想的最好诠释当属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按照他的观点,人类只有在能够提出新的理想、新的更加完美的模式时才有历史——历史应该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而现在人类的历史已经终结在了西方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阶段上。这是一个近于尽善尽美的社会,它可以满足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各种需要,是人类可能设想或可能达到的最高阶段。以前的一切制度,都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和不可避免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只能以推翻现有制度为前提。而在实行了代议制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中,虽然仍会有各种矛盾,但这些矛盾都可以在体制内部得到消除。我们可以认为,福山通过自己的论证,否认了其他思想或制度存在的最低合理性,从而在事实上宣告了单一思想的诞生。一切与之不同的声音,或是被贬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或是被简单斥之为过时的谬误。西方思想的高度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限制,变得极度的统一,极度的沙漠样的贫乏:大家只是在争论谁比谁更具有民主性,谁能实现更高的效率,却没有人——首先是理论界的精英——能够提出与之不同的、可能成为替代物的新理念、新目标,哪怕是甘冒被称为保守派或疯子的大不韪。正如一位西方记者所言:“如果我们在经济方面拒绝单一思想,我们会被认为没有能力;如果我们在政治方面拒绝它,我们会被认为愚蠢;如果我们在道德方面拒绝它,我们则会被人骂为混蛋。”单一思想就是这样成为了美国意识形态斗争的利器。

我们必须指出,单一思想是西方主流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它的理论基础是二元论思想、线性历史发展观及由此派生的乐观—理想主义。

法国政治学家马特教授(Jean-Louis Martres)曾对西方主流思想的核心密码和主要框架做过精彩的分析。在他看来,这首先是一种严格的二元论思想,认为世界被分为“善”和“恶”两大部分。这两部分是绝对的,是截然对立、不可调和、不可转化的。善便是绝对的善,恶也是绝对的恶;善绝对地高于恶、优于恶。人类政治活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进善对恶的胜利:由掌握了善的思想、了解了善的秘密的人执掌政治权力,并用这个权力去压迫乃至消灭恶的代表。两千多年来,西方政治思想的内容当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种二元论的理论框架却一以贯之。“善”的代表可以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是上帝,可以是“公意”,也可以是美国价值观。它们都是绝对的,其内部不可能有质的不足之处——如果现实还不够十全十美,原因只能是我们对善的实践还不够彻底和绝对,只能归咎于“恶”的干扰。而一切与之相对的思想和实践,则不可能有丝毫道理,都必须被压制乃至清除。自认为掌握了真理的人,自然有权利要求别人的皈依。归根结底,这还是为了皈依者的好处:谁有权利或必要来抵制真理光芒的照耀呢?正如卢梭所强调的那样:“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不会犯错误的善的代名词)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简单地讲,西方两千年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讲便是这样一部善恶斗争史。而黑格尔和福山也正是因此才认为

如果没有了新的善恶之争,如果善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人类的历史也就终结了。然而事实上,在二元论的体系中,善又无法取得最终胜利,或者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一旦宣布了最终胜利,一旦没有了对手,它便无法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及存在的必要性了。马基雅维利早就告诫过掌权者:“一个英明的君主一有机会,就应该诡谲地树立某些仇敌,以便把它制服,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伟大。”在西方文化中,清教文化是一种最为典型的二元论文化。受清教传统支配的美国恐怕也无法设想一种和平共处的世界格局。没有了敌人,它会感到手足无措;会无法证明自己的优越感及存在的合法性。所以在战胜了自己以前的对手——“邪恶帝国”苏联后,美国正处在寻找新的战略敌人的过程之中。米洛舍维奇也好,萨达姆也好,“中国威胁论”也好,都不过是这种被迫害狂情结的牺牲品。但对那些一厢情愿的善良的人们来讲,问题在于如果美国必须要有一个敌人,我们怎样才能保证它找到的不是我们?我们可以说,二元论的思想中虽不乏人道、仁慈、道德的信条(现在的口号则是民主与自由),但它在本质上经常是绝对的、偏执的、极端的,尤其是不宽容的。它是单一思想的基础和温床;它所致力于的,实际上就是单一思想的统治。

与二元论思想密不可分、一起决定着单一思想的,是线性的历史发展观。这种理论首先假设人类历史有一个起点,因而也有一个终点;其次认为历史是一个循由低向高的、不断“进步”的规律的线性运动过程;而历史的意义便在于它的最高阶段——善的实现。最后认为这种运动或规律是由某种特定因素所决定的。只要我们认识了这种因素,掌握了这种规律,我们便可以预知历史,甚至改变历史。尽管有着希腊传统,线性历史观主要还是基督教的产物。在基督教那里,历史有一个起点——上帝造人和一个终点——末日审判或天国。人类世俗生活的全部意义便在于不断地与恶(原罪)做斗争、不断地完善自己、提升自己,最终使自己进入天国——达到历史运动的终点,终结历史。与二元论思想的历程相似,线性历史观的具体内容随时代推移在不断地变化着,但其核心精神则始终如一。历史的终点可以是天国,可以是大同世界,也可以是民主的普遍化,总之是善的最后实现。

如果我们自认为掌握了绝对的、唯一的善;如果我们自认为洞晓了历史的规律、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我们自然没有理由不是一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在历史还没有终结时,我们自然应当理想主义地去追求善的最终实现。长期以来,理想主义者一直受到人们的赞颂,人们对现代社会经常的批评之一便是其中的理想主义者太少。这个社会需要理想主义吗?回答当然应当是肯定的。但如果我们身边充满了极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这个世界就会进入大同吗?对此人们又应当提出疑问:人类历史中的种种冲突、战争、不幸及苦难,是否不时地与理想主义者对绝对真理的实践尝试有关?而在国际关系中,所谓的理想主义就尤其危险,因为它经常是强权者推行自己价值观的美丽外衣。它所意味的就是单一思想的统治。这种危险决不只是存在于理论层面,它也可以十分直接和暴烈:“真理”的执有者、检验者、裁判者已开始习惯于用隐形飞机和巡航导弹来强制推行“真理”,来进行武器的批判。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抛开美国和北约的战略考虑不谈,实际上是战后第一次真正的意识形态战争,是以人权和民主为口号而发动的战争。

从这个视角审视中美关系,我们大概可以得出结论: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差异,使得双方甚难有一个彻底的相互理解。这一点在美国一超独大、志得意满、自认为

掌握了全部的真理及其解释权、洞晓了人类发展规律、试图寻找敌人的时候显得尤为突出。中国传统思想并非不明于善恶之辨,但这两者间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和先天、先验的——因为没有一个作为善的象征的人格化了的上帝。中国思想带有强烈的相对倾向,而“道”本来就是混一——一切对立物的至高至大。退一步讲,善固然相异于恶并优于恶,但善恶却又是互相依存,尤其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如老子所谓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中国人虽然有时也讲要除恶务尽,但更多强调的却是平和、留有余地、不为已甚。这种思维方式是西方人很难真正理解的。在他们看来,善恶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斗争关系,而斗争的决定性因素是力量。再考虑到我们所坚持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实在不必对一种在根本上和睦的中美关系心存奢望(共产党还可以在非清教传统的西欧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共产主义在那里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在美国他们却无法得到生存空间。文化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当然,两国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及由此产生的隔阂并不一定意味着斗争;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斗争也不一定意味着总体性斗争;也不是所有的斗争都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这是二元论者的思维方式。作为两个大国,中美之间自然有利益上的重合点,和平共处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这种理性思维所得出的结论自不需赘言。我们不能要求美国当局改变他们的二元论思维传统,但我们可寄希望于他们的现实主义选择。○

## 美国对外决策机制的变化与中美关系

宋新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教授)

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从美国对华政策角度分析,我们不能忽视美国对外决策机制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冷战期间,对苏遏制战略在美国国内有高度共识,因而其对外政策的制定相对简单,即所受内部因素干扰的程度较小。首先,就行政与立法部门比较而言,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权主要集中在行政部门。其次,就行政部门内部而言,则体现为“白宫中心”模式,国家安全委员会往往成为总统管理对外事务所依赖的主要机构。第三,社会因素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包括有各种背景的智库、学者、大众传媒、利益集团、公众舆论,等等,都会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冷战期间精英决策模式在美国对外政策领域比在社会以及其他方面的政治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例如,在对华政策方面,具有信息优势的学者就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对此,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哈里·哈丁曾谈到,当时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至少扮演了五种重要的角色,即:经济顾问、情报分析者、媒体信息的提供者、政策建议者、公众教育者。第四,对外政策目标有很强的延续性。这在杜鲁门到约翰逊时期表现尤为明显。即使在美国全球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的 70 年代也是如此。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就有很大的关联。

必须指出,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初期,美国国内外环境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对外政策机制也随之出现一些转变。一方面,越战结束和“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立法—行政关系的天平开始改变,国会加强了关于对外事务的干预。另一方面,美国社会进一步多元